

塔传入中国后，为什么变成了楼阁

●杭侃

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，借助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，在汉晋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，并且在东晋时期出现了“塔”字。玄奘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六说宝塔：“正言窣堵波(stupa的音译)……塔字，诸书所无。唯葛洪《字苑》云：‘塔，佛堂也。’葛洪为东晋时人，也就是说，在东晋以前没有‘塔’字。”

“塔”字出现得虽然晚，但作为建筑形式，随着佛教传入就已经产生。从理论上讲，中国早期的塔应该模仿印度，印度本土早期的佛塔为覆钵式的舍利塔，整体形象像一个倒扣的碗。但是，中国最先出现的并不是覆钵式塔，而是与楼阁相结合的楼阁式塔。

楼阁式塔是楼阁上增加了塔刹而形成的。早期明确的形象，如2008年湖北省襄樊市(今湖北省襄阳市)樊城一座墓葬出土的佛塔模型。这座模型有两层，通高104厘米，屋顶有7层相轮，塔刹顶端有仰月。

发掘者认为，这座墓葬属于三国时期，考古学家何志国认为“将该墓年代定为东汉中期较为妥当”。1986年6月，四川省博物院(今四川博物院——编者注)的工作人员在什邡采集到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，也有清晰的楼阁式塔的形象。

楼阁和楼阁式塔不同，楼阁式塔必须具备佛塔的标志——塔刹。塔刹的基本形式是覆钵式塔的缩小版，也就是说将印度形体巨大的覆钵式塔，微缩之后放置于中国传统的楼阁顶上，就形成了楼阁式塔。

魏收《魏书·释老志》将塔的出现与佛教的传入联系在一起，“自洛中构白白马寺，盛饰佛图，画迹甚妙，为四方式。凡宝塔制度，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，从一级至三、五、七、九。世人相承，谓之‘浮图’，或云‘佛图’”。

魏收未必得见“天竺旧状”，他所描述的塔的情况，很可能是根据之前的中国情况所作的总结。北魏天兴元年(398年)，道武帝在首都平城建有五级佛图；天安二年(467年)所建平城永宁寺“构七级佛图，高三百余尺，基架博敞，为天下第一”，都是描绘的楼阁式塔。

最早提到中国建造佛塔文献，是陈寿的《三国志·吴书·刘繇传》，不过那时的塔被称为“浮图祠”：“乃大起浮图祠，以铜为人，黄金涂身，衣以锦采。垂铜盘九重，下为重楼阁道，可容三



湖北樊城一座墓葬出土的佛塔模型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俞莉娜供图

千余人”。这里的“垂铜盘九重”，吸收了西方式样，“重楼”没有指几层，“重楼阁道”可以容纳3000人之多，形式应当近似于甘肃雷台汉墓(此墓因出土“马踏飞燕”而闻名——编者注)所揭示的楼阁式塔形象。也就是说，塔这种建筑的主体是中国式的，只是在中国的楼阁上加了一个塔刹。

那么，为什么佛教在传入中国后，覆钵式塔并没有成为流行样式，而是与中国的楼阁相结合呢？

楼阁在汉代图像和实物模型中多有表现。汉代有“仙人好楼居”的说法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了汉武帝对仙人说：“仙人可见，而上往常避，以故不见。今陛下可为观，如缑城，置脯枣，神人宜可致也。且仙人好楼居。”于是，汉武帝令长安作建章观，甘泉作延寿观，使人持节设具而招仙人之属。

这件事情发生在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

年)。公孙卿是齐地的方士，在此之前，已有不少“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”进入宫廷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，秦始皇东巡至琅琊，后遣齐人“入海求仙人”；汉武帝时著名的方士栾大、公孙卿都是齐人，公孙卿的老师申公也是齐人；《汉书·封禅书》记，“海上燕齐之间，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，能神化”；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称，“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”。可见，秦至西汉的修仙之说盛行于燕齐一带。

为什么齐地会产生“仙人好楼居”的说法？笔者以为这和海市蜃楼的现象有关。海市蜃楼，是一种因光的折射和全反射而形成的虚像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认为：“海旁蜃(蜃)气象楼台；广野气成宫阙然。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。”我国古代把蜃景看成是仙境，秦始皇、汉武帝曾率人前往蓬莱寻访仙境，还多次派人去蓬莱寻求灵丹妙药。

为什么叫蜃楼？明朝陆容《菽园杂记》说：“蜃气楼台之说，出《天官书》，其来远矣。或以蜃为大蛤，月令所谓蜃人大海为蜃是也。或以以为蛇所化。海中此物固多有之。然海滨之地，未尝见有楼台之状。惟登州海市，世传道之，疑以为蜃气所致。”

这虽然属于迷信，却是古人的坚信。黄海、渤海交汇处的长岛群岛，位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，是中国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域。长岛正处齐地，“仙人好楼居”的说法来自于齐地的方士就不难理解了。

战国至秦汉时期，人们对建筑高度的追求盛行一时，在图像中多有反映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记载了一座形制特别的高楼“井干楼”。《史记索隐》引《关中记》：“官北有井干台，高五十丈，积木为楼”。言筑累万木，转相交架，如井干”。难以想象，井干楼要耗费多少木材？是否真的达到了五十丈？但是，汉代图像和实物模型中的楼阁是这种风尚的反映，则是没有问题的。

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，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，往往比附中国固有的神仙系统而传播。考古学家温玉成将之称为“仙佛模式”。可以说，佛教和佛塔一进入中国，就与本土文化相结合，开启了中国的进程，而楼阁式塔的出现，是创新的结果。

包容才能创新。

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开创了中国诗词抒发家国情怀的五种典型样式：

第一类，去国之思，离国之痛。《卫风·河广》云：“谁谓河广？一苇杭之。谁谓宋远？跂予望之。”客居异乡，遥望思念自己的家国，情深而无奈。这类诗词在宋朝达到了极致。

北宋鼎盛期，版图只有唐朝的1/5至1/3；南宋偏居一隅，再来一个腰斩。范仲淹“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”的“燕然”，苏轼“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”的“云中”，岳飞“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”的“贺兰山”，陆游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”的“轮台”，都不在宋朝版图之中。

陆游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”、陈亮“尧之都，舜之壤，禹之封”、辛弃疾“何处望神州？满眼风光北固楼”，去国之思上升为离国之痛，终于到最后成为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亡国之悲。

第二类，怀古伤今，盼国中兴。《王风·黍离》云：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。”远行者经过故都，见宗庙宫室遗址上黍稷离离，内心忧伤不已。这类诗词发展为后来的怀古诗词。其中的不少诗词，不仅仅停留在怀古，还深藏着对国家中兴的期待。

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是曹操期待结束生灵涂炭、恢复天下一统的沉思，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是王昌龄、杜甫的深情呼唤，“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”“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是刘禹锡、杜牧对历史兴亡的感慨。

第三类，舍家报国，一往无前。《秦风·无衣》云：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。”对于这首诗歌，曹植的名句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堪称最好的概括。这类诗词在唐代边塞诗中达到了高峰。

唐代的边塞诗，题材广阔，意象宏大，基调昂扬，大气磅礴，歌行、绝句、律诗各种体裁兼备，堪称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、想象力最丰富、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，亦是古诗词中国家情怀的最好体现。

高适“相看白刃血纷纷，死节从来岂顾勋”、王昌龄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、王维“孰知不向边庭苦，纵死犹闻侠骨香”、祖咏“少小虽非投笔吏，论功还欲请长缨”、李白“晓随金鼓，宵抱月鞍”、卢纶“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”、李贺“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”、王翰“醉卧沙场君莫

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、李颀“白日登山望烽火，黄昏饮马傍交河”，严武“更催飞将追骄虏，莫遣沙场匹马还”……唐代的边塞诗有牺牲的悲壮，却没有屈辱的悲伤。这是大唐的精神，也是值得推崇的家国情怀。

唐代的边塞诗是高峰，但并不是说之后这类诗词就没有了。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多是横戈马上行”、清代将军杨昌浚“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”，读来依然让人血脉偾张。

第四类，时运不济，忧国忧民。《小雅·节南山》云：“不吊昊天，乱靡有定。式月斯生，俾民不宁。”无缝承接这一忧国忧民的感情人，当数屈原——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，传诵千古，绵绵不绝。

之后，唐代大诗人杜甫亦堪称代表。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“花近高楼伤客心，万方多难此登临”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”……如此悲天悯人的情怀，让杜甫成为公认的“诗圣”。

李白与杜甫之高下，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窃以为，就艺术的天才性而言，杜不如李，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，李不如杜。这个思想的深刻性，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家国情怀上。

杜甫之后，白居易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”“一从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”，忧民多于忧国。北宋李纲“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”，明代于谦“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”，也值得一记。

第五类，歌颂英雄，安邦定国。《大雅·皇矣》云：“依其在京，侵自阮疆……万邦之方，下民之王。”这里，歌颂的是周文王治武功、开疆拓土，救民于水火。

汉高祖刘邦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”，是对自己的歌颂；唐太宗李世民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”，是对重臣的歌颂；唐朝诗僧贯休“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十四州”，是对吴越王的歌颂。

上述五种类型经常交织在一起，甚至在同一位诗人或同一篇作品中都有交织，使得任何分类都有些顾此失彼。但不加以条分缕析，又会失于笼统和混沌。

从“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阖棺”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到“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”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”，“家国情怀”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，而更近乎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精神归属。

此日中流自在行

——朱熹的山水哲思之路

●徐亚豪



宋徽宗未文公画像

朱熹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作者提供

朱熹(1130—1200)是孔孟之后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者，世称“朱子”。作为理学宗师，朱熹同时也是成就斐然的诗人和探索自然的“科学达人”。他平生酷爱山水，钟情游历，足迹遍布闽、浙、湘、赣四省的名山大川。《朱子语类》记载他“每观一水一石，一草一木，稍清阴处，竟日目不瞬”，在朱熹传世的1000多首诗歌中，有关山水题材的达420余首，他将心灵的哲思与山水的意趣融为一体，描绘出一幅充满生命智慧的文化地图。

武夷：“我是溪山旧主人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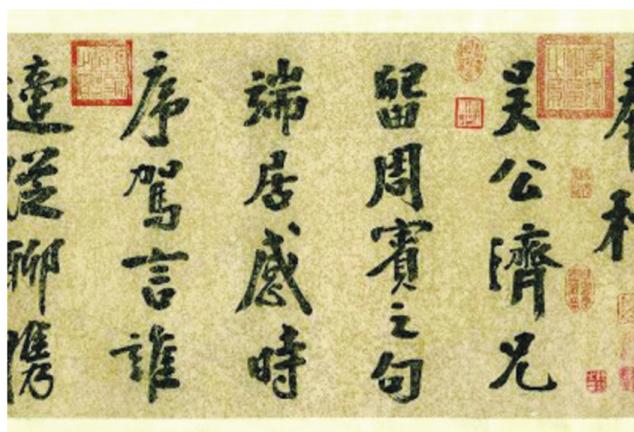
朱熹的原籍为徽州婺源(今江西婺源)，因父亲朱松在福建为官，便举家迁居福建。在朱熹71年的人生旅程中，有近50年的时间是在武夷山地区度过的。武夷山风光秀丽、烟霞环绕，有九曲溪蜿蜒其中，自古便有“奇秀甲东南”的盛名。朱熹在理学著述、书院讲学之余，感叹“书册埋头无了

日，不如抛却去寻春”。他劝勉友人“满意分携一杯酒，登山临水不能休”。他晚年曾满怀深情地说：“我是溪山旧主人，归来鱼鸟便相亲。”

朱熹自幼聪慧，刚会说话时，父亲手指苍苍告诉他这是“天”，朱熹便问道：“天之上何物？”善于思考的特质，幼时便初露端倪。10岁时，读到《孟子》中“圣人与我同类”的说法，朱熹兴奋异常，从此立志要做圣人。绍兴二十三年(1153)，24岁的朱熹在延平拜会著名理学家李侗。李侗是“二程”(北宋理学家程颢、程颐的合称)的三传弟子，在他的教导下，朱熹学问大进。他把读书为学的感受，巧妙地通过山水诗抒发出来。他的诗一反理学诗的说教意味，往往亲切有趣，引人深思。《观书有感》便是其中代表：“昨夜江边春水生，蒙冲巨舰一毛轻。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”

乾道二年(1166)，朱熹对儒家经典《中庸》当中“未发已发”的问题突然领会，史称“丙戌之悟”。3年后，朱熹再次顿悟“心、性、情”之间的理论关系，史称“己丑之悟”。至此，朱熹的思想趋于成熟。在《九曲棹歌》中，他借用游览武夷胜景的经历，分享自己艰苦求学而获得突破后的喜悦：“莫言此地无佳景，自是游人不上来。”在山水环绕的美景中，朱熹先后营建寒泉精舍、紫阳书院、考亭书院，授徒讲学，笔耕不辍，编著《近思录》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等经典，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。

在理学之外，朱熹还对探究自然规律抱有浓厚兴趣，体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。不论是日月星辰、山川草木，还是四时之气、风霜雨露，都是他“格物”的对象。例如，朱熹在高山上看到朝晖，指出这是海陆变迁所导致的；他曾命自己的学生在夏至时测量日影，来比较不同地区日影的长短；朱熹还在家中放置浑天仪，用以研究天文历法；他重视地图的科学制作方法，并亲自用胶泥实



朱熹自书五言诗(局部)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由作者提供

践。朱熹对这些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，在很多方面都符合现代科学的方法。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认为他是“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”，比西方早出400多年。我国科技史学家吴道静称他是“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”。

浙江：“西湖风月弄扁舟”

浙江在宋代分为两浙东、西二路，是南宋都城临安(今杭州)所在地。朱熹多次往返于闽浙之间讲学。浙江承载着他“帝王师”的政治理想。在《吴山高》中，朱熹写道：“行尽吴山过越山，白云犹是几重关。若寻汗漫相期处，更在孤鸿没没间。”浙江的山川名胜，激发了朱熹的深沉哲思。

西湖及四周的山陵古刹，赋予了临安这座城市空灵悠然的底色，是文人墨客挥酒诗情的胜地。绍兴十八年(1148)，19岁的朱熹赴临安参加科举考试，得中进士。临行时，朱熹作一首《远游》长诗，抒发其豪情：“举坐且停酒，听我歌远游。远游何所至，咫尺视九州。”在等待发榜的阴雨天气里，朱熹登览天竺山，泛舟西湖上，写下“春风不放桃花笑，阴雨能生客子愁。只我无心可愁得，西湖风月弄扁舟”的诗句，描绘了初到京城青年才俊，在西湖胜景之中，油然而生出无限期许之情。

不过，朱熹却无意于官场亨通。《宋史》记载他“登第五十年，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朝才四十日”，其余时光，他都醉心于讲学传道，只做不需理事的祠禄闲官。绍熙五年(1194)，朱熹出任宋宁宗的侍讲官，这是他理想中的职位。他期待自己能够“得行道”，但很快就因朝廷党争而受到排挤，被迫离京。正如辛弃疾在赠予他的诗中所赞许的：“山中

有客帝王师，日日吟诗坐钓矶。费尽烟霞供不足，几时西伯载将归。”朱熹阐扬的王道政治与心性理学，终于在后世发扬光大。

元明清时期，朱熹的理学思想被朝廷钦定为官方哲学，其著作也成为古代科举考试的教科书。因此，全国各地的考生逐渐把朱熹尊奉为“考神”。在成都，曾有朱熹后裔定居，他们建造“朱熹宗祠”，并取“登科中甲”的吉祥之意，将宗祠所在的巷子命名为“科甲巷”。据传，每逢四川乡试，赶考者便纷纷而至，纷纷入住科甲巷、朝拜朱子祠，以祈求科举高中。

南岳：“行藏只此验天心”

乾道三年(1167)秋，朱熹为领教湖湘学派的义理，在弟子林用中陪同下，前往湖南潭州(今长沙)访问张栻。张栻是南宋名相张浚之子，师从著名理学家胡宏，为湖湘学派的传人，与朱熹、吕祖谦并称为“东南三贤”。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论道，为期两月之久，史称“朱张会讲”。当时，两人皆是名震天下的儒学大师，前来听讲的士人学子不计其数，岳麓书院从此声名远扬。会讲之余，两人共览岳麓山，同登定王台，抒怀赋诗相赠，结下了深厚友谊。朱熹后来用“年华供转徙，眼界得清新。试问西山雨，何如湘水春”的感慨，来纪念这次相聚。

岳麓会讲后，二人仍觉意犹未尽，便相约共游南岳衡山。作为中国佛道文化的圣地，衡山位于湖南中部，前后绵延八百里，共有峻拔奇峰72座，其中祝融峰、水帘洞、方广寺、藏经殿，被称为“南岳四绝”。唐代大诗人韩愈曾赞叹：“祝融万丈拔

地起，欲见不见轻烟里。”朱熹一路游览，吟赏不断，写道：“我来万里驾长风，绝壑层云许荡胸。浊酒三杯豪气发，朗吟飞下祝融峰。”身临南岳胜景，朱熹不禁生出万丈豪情。

在短短7天的旅途中，朱熹二人唱和吟诗共计149首，编为《南岳唱酬集》。这次游览实际上是“岳麓论道”的延续。他们在山水之间的漫步，更像是一场与自然和心灵的对话，一次哲学的探索之旅。“晚峰云散碧心寻，落日冲霄气深。霁色登临寒夜月，行藏只此验天心。”在理学家朱熹的眼中，山水不仅是风景，也是一部蕴藏着无尽哲理的巨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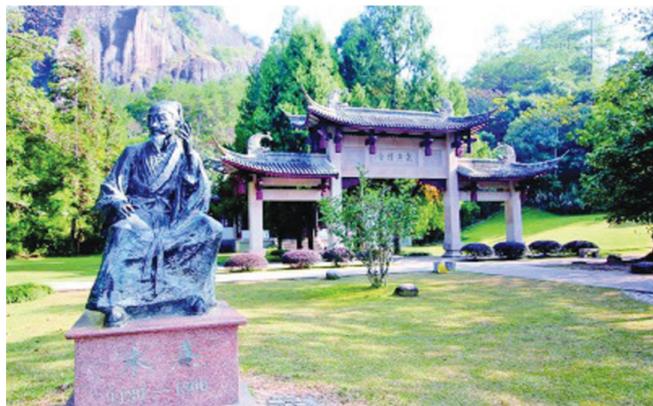
江西：“不信人间有古今”

淳熙二年(1175)，吕祖谦与朱熹相会于福建寒泉精舍，共同编撰《近思录》。而后，吕祖谦为调和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分歧，便邀请朱熹在江西的鹅湖书院当面论学，史称“鹅湖之会”。在会上，双方就“教人之法”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，朱熹强调“格物致知”，陆九渊主张“发明本心”；朱熹认为陆九渊是“禅学”，陆九渊讥讽朱熹为“支离”，二人争执不下。尽管在辩论结束时，双方也未能统一意见，但“朱陆之辩”的回音经久不衰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。

淳熙五年(1178)，朱熹任江西知南康军。陆九渊的兄长陆九龄来访问讲学，朱熹赋诗相赠：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。却愁说到无言处，不信人间有古今。”诗中表达出对自己学问的坚持和自信。3年后，朱熹邀请论敌陆九渊来自己重新修建的白鹿洞书院，为学生宣讲《论语》中的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一章，体现出他作为理学大家的胸怀。朱陆二人在江西书院的讲学活动，构成了中华文化史上的华彩篇章。

在江西为官期间，朱熹钟情于庐山的奇秀俊美，“眷眷山水心，幸此朱墨暇”。空闲之余，他携友游览庐山，几乎踏遍了这里的山水名胜，并创作诗文70多首。登五老峰，他赞美“中岩碧林晓，青天白云屯”；往卧龙潭，他感叹“泻石奔流直落，冲天瀑空”；游三峡洞，他发问“一水从中来，涌涌知几折”；探白鹿洞，他痛心“学馆空废址，鸣弦息逸歌”。庐山的绝美景色，在朱熹笔下化作浓浓的诗情。朱熹晚年对庐山仍难以忘怀，他写道：“匡庐不见几经年，一话清游一怅然。”可见，庐山已成为萦绕在他心中的深深眷恋。

如今，为纪念朱熹的文化行迹，海峡两岸联合创设了“朱子之路”研习营，成为青年学子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学习的重要平台。“走朱子之路，行朱子之心”，漫步在朱熹的文化地图中，我们仿佛也能走进那片心灵栖息的山水世界，感悟他的哲思，体会自然与人生的真谛……



武夷山紫阳书院是朱熹营建的书院，又名“武夷精舍”

孙同超 摄/光明图片 图片由作者提供